寻梦环游记》在中国火了。主创团队说，这是一封写给墨西哥的情书。这“情书”不仅打动了墨西哥民众，也打动了许多中国观众。豆瓣影评为它打出了9.0的高分，超过97%的动画片。这部影片也因此激发了许多中国观众对遥远国度墨西哥的兴趣。  
　　文学也有类似的影响。莫言曾说，他的早期创作受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我当年想好的见到马尔克斯时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我在梦中曾经与你一起喝过咖啡，但哥伦比亚的咖啡里面，有点中国绿茶的味道。”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明交流，就在这样的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中展开。如今，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16国已建立36所孔子学院和11个孔子课堂，在墨西哥城设立了首个中国文化中心；巴西电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钢鼓等许多拉美文化艺术作品也来到了中国。在拥有灿烂文明、悠久历史的两片土地上，文明交流就像一座跨越太平洋的桥梁，让人们彼此走近。  
　　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  
　　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领导的治理方式：  
　　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却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论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来逼太后让步。对此，陈琳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为什么去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理论和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不可以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制图：蔡华伟  
　　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众哲学》，影响之大，如雷贯耳。据说蒋介石退到台湾后，在理论总结方面多次提到，我不是败给中共的军队，而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要求部下包括他的孩子好好研读《大众哲学》。蒋介石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2014年9月，在《大众哲学》发表8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主编的《新大众哲学》。该书7卷本，80多万字，以当年“大众哲学”的方式对现实做出世界观方法论的解答，契合了时代的新需要、人民的新期待、党和国家的新要求。该书出版3年来，深受欢迎，颇多好评。为进一步方便广大读者学习，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伟光删改主编的《新大众哲学（简明本）》，全书30万字，简明扼要，亮点纷呈。  
　　该书分总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5篇，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与阐明，在回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在新的条件下解释世界引领发展。这是历史赋予哲学的重要责任，也是《新大众哲学》自觉肩负的时代使命。  
　　在表述方式上，该书避免纯粹的抽象思辨和老旧教科书式的照本宣科，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中国老百姓的话”，追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简洁明快，让大众好看、好学、好用。该书有个特点，在大多章节的前面，有一个故事作引子，如“信息论”这一章里，有“情报拯救了以色列”“蜻蜓低飞与天要下雨”“没有驾照的人也可以开车了”等故事，在“照辩证法办事”一章里，有“怎样练就‘火眼金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功”“蝴蝶效应与彩票中奖”等故事。这些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从故事里引出哲理，使文论表达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从而使高深的学理返璞归真，为大众掌握，为大众所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利益，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不断改善民生，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习总书记为何这样重视人民利益呢？该书在《利益分析法》这一章里表达了独到见解，认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生重于一切。如果顺应人民的利益，重视民生，那么便会推动历史的进步；如果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无视民生，那么人民便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同违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民生要求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相一致，能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干部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行动自觉。  
　　关于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选择性，该书也有精彩论析，指出：历史过程就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和人的主体活动的统一，是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辩证决定与主体选择的统一。我们既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又要发挥人的认识、选择能力，在多种可能性空间，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必然，但我们不能坐等这个“必然”，而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万众一心，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埋头苦干，方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成美丽的现实。这是《新大众哲学》给读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学要有新作为。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作家怎样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怎样塑造新时代的典型形象，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怎样在文学创作领域进行艺术创新，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过去，我们在书斋里编织故事，可能也编得像模像样，但我曾反思和自问，什么叫有生活？什么叫有生活积累？生活贵在体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故事可以编织，但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我曾细细地追问自己：心中到底还有多少感情积累，真正了解农民吗？说不了解，不现实，但了解的还是以表面居多，未能深入到农民的内心，对他们复杂的喜怒哀乐也掌握不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精准扶贫和绿色生态理念已经在中国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京津冀协同发展、城镇化建设、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历史的丰富变化尽收眼底，但怎样认知与书写这场城乡巨变？我作为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做过一些探索，有收获，也有迷惘。我下定决心继续探索和寻找，生活是丰富的，只要生活在继续，突破口总会有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充沛的感情积极拥抱现实生活。有了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时代生活进行了充分认知、理解和提炼，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这样几个维度不容忽视：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对本土性的准确阐释；三是重视中国美学神韵，而传统意蕴和神韵多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四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经验积累。这是摆在我们作家面前的新课题。直面现实是有难度的，现实有崇高，也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美好，也有疾患，但作家的内心不能阴暗。作家要有强大的爱心，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人民，作家要不断调整自己，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发现美好的能力，从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文学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肝胆相照。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心中应该永远装着人民，而离开人民的文学创作一定会枯萎。首先要培养对农民和土地的感情。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们一直都在土地上劳作，想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土地一直在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内心的勇敢、力量和尊严。作家只有不丢掉普通劳作者的感受， 才能懂得农民的喜怒、理想和希望。我们的文学需要诚实地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寻找灵感，才会有力量、有风骨。  
　　十几年来，上级安排，我在唐山故乡挂职副村主任、副县长体验生活；几年前，经朋友介绍，我在北京昌平曹碾庄和燕山深处的长城脚下白羊峪体验生活。其实，体验生活也是品读生活，品读生活就是品读自己。著名作家柳青说，作家要想塑造英雄，自己首先愿意当英雄。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新时代的《创业史》，我的思路逐渐清晰，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背景，写河北农民的故事，塑造新的农民英雄形象。  
　　我遇到过一位农民，他的故乡在燕山，人在北京打工。他的经历告诉世人，城里的农民融得进城市，也回得了故乡。这个回乡农民帮助乡亲们进行了一场脱贫斗争，后来演变成跟外国种子对抗，寻找我们中国的种子——大豆、土豆、玉米等老种子。燕山白羊峪一带的老种子基本绝迹了，他走遍燕山山脉也没找到，于是跟着亲戚找到太行山的涉县。他在涉县的老姑爷，死时带了一罐谷子进坟墓。按当地民俗，先用猪和羊领牲，哭灵三天三夜，然后才从坟墓中取出老种子，在燕山长城脚下的梯田里建起小小的种子库。这个事件感染了我，我多次回故乡燕山，三次去涉县，对这个农民进行采访。他是那样幽默、辽阔、质朴，他的精神是珍贵的。在燕山深处，我还找到一位种植苹果的农民，绿色生态理念深入他的内心，他坚持不用农药，即使苹果四年不开花，依然悲壮地坚持，终于用沼气液杀掉虫子，培育出了金苹果。这几个农民的故事成就了我在小说《金谷银山》里塑造的主人公范少山。范少山不为自己富裕，而要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他身上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蕴含传统文化的精神，他身上折射了我们农民的中国梦。他的故事本身有穿透生活表象、直抵生活本质的力量，同时具有温暖人心和激励人心的力量。是生活给予了我正面塑造人物灵魂的能力，感谢生活吧！  
　　通过创作《金谷银山》，我分明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变化。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形成。农民的故事、心理变化和命运起伏都将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展开。从乡土里来，往灵魂里去，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通过塑造范少山这个人物形象来“落地”的。我想，只有从人性丰富多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民的行为动因，才能给乡土小说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灵魂。让农民找到一种庄严的人生，在砥砺奋进的创业中站立起来！  
　　（《金谷银山》：关仁山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5日公布，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大家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基石，宪法因时而发展、因势而完善，将更好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需要，进一步引领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党和国家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征程。吉林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盛美军说，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让大家感受到坚定不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坚定决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重要特点。历史证明，凡是宪法修改和实施得好的时候，法治就能发展进步，党和国家就能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前进。反之，人民利益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损失。”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委书记任厚明说。  
　　福建省莆田市政法委副书记廖仁喜表示，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家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也体现在法治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上。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恰逢其时，将有效契合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为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好基础，筑牢新时代治国安邦的“定海神针”。  
　　“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建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的重大举措和郑重宣示，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清醒认识、坚定自信和高度自觉。”河北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肖可义激动地说，宪法不断发展进步，必将保障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宪法建设和法治建设紧密结合，是推进国家法治化“换挡提速”的根本保障。  
　　贵州省务川县委副书记刘进表示，党中央的宪法修改建议，吸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各方面的新经验、新成果，对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发展方向、改革决策等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宪法与时俱进，就是要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实现。  
　　“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一字之变，蕴意深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动态整体建设，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飞跃。  
　　将国家法治建设最新成果写入宪法，打造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法律指南。  
　　“对地方立法权的完善，是宪法修改建议的一个亮点，更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识。”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表示，党中央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整体要求，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软硬实力同步提升。  
　　成都市锦江区纪委监委转隶干部王凉说，明确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保证国家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等公权力在宪法框架下和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党中央的修宪建议，体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精神，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修改宪法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宪法，让宪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保障。”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莫江平说，新时代的各项事业建设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宪法修改完善，会让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更有法治保障。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常务副区长管雪表示，近年来，党中央以上率下、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用具体行动指明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方向。“基层党员干部更要努力落实宪法精神，强化法治思维，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依靠人民源自肺腑的信仰。只有全社会都自觉将宪法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前进。  
　　浙江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中毅表示，人民法院将发挥普法先锋作用，利用修改宪法这一契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把全面依法治国推向新境界。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党中央修改宪法的建议顺应党心民心，要推动宪法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法治之基。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事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